



永恒的宗旨 坚守的定力
仲呈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用光影与时代同频共振、与观众心灵互动 于冬(中国影协副主席)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背景下召开的“电影：时代与人民”专题座谈会，意义重大。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的最高成果，那么，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经典性、永恒性和永远要坚持的真理。这真理是什么？第一条就是时代与艺术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救亡背景下要求文艺工作者，就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必然要求。

另一条经典性的结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艺术都是为人民群众的，首先是工农兵”，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救亡背景下要求文艺工作者，就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必然要求。

当前，电影市场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新技术的涌现与新势力的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驱动力。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变化。如今，国内的互联网平台纷纷涉足电影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发行与票务销售，更主动出击，投资电影项目，签约导演、参与剧本创作，力求填补并优化传统电影公司在这些环节上的不足。这一趋势势必使传统电影公司要深刻反思，意识到与互联网平台融合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与其有效对接，以实现深度融合与平衡发展。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迁，最终还是要靠电影作品说话，观众是检验作品的最终投票人。中国电影市场需要好作品，好作品需要好的创作环境。

我们更致力于题材创新。中国电影业的崛起需要站在世界的维度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填补中国电影题材空白，而不是简单地参与全球市场的短期竞争，通过翻拍、模仿或炒卖来维持现状。相对美好莱坞的六大公司辐射全球的能力，我们的海外市场还相当小，“中国电影”如果要成为“世界电影”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我们要面向全球市场，创作具有广泛影响力 and 世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近年，新导演群体不断涌现，为电影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活力，与中国电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创作人员也敢于突破传统的生产模式，创作人员更可以消解更多样化、更加具有可选项性的视听内容，越来越远方、越来越多元。影院电影模式、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中国电影的改革，需要继续完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目标应该是电影管理者和电影从业者达成共识，那就是如何破局，如何推进，则更为关键。需要做的事很多，首先是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这部法律是中国电影改革成就和智慧的法律结晶，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文化领域的行业法”，我们需要结合近年来电影管理、电影生产的深刻性电影改革文化氛围，营造一种既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高雅而不低俗的电影鉴赏氛围，这是一种健康的文明欣赏心态。这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要反对单纯以票房多少衡量一部电影的思想艺术价值，要建立注重人才培养的素养、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影观，应该是立足提升民族的电影欣赏素养、提升民众精神素养的精品力作，这种电影“一以当十”。在观赏《解密》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内心不禁涌起一个念头，若每年都能有数十部这样深刻描绘人类信仰、颂扬精神力量的佳作问世，且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中国电影迎风而立，深化改革不可待 尹鸿(中国影协副主席)

在全国各行各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结合电影界的现状和实际，召开这次座谈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第一，中国电影改革，成绩斐然，来之不易。无论是过去20年，还是最近这10年，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的前后5年，中国电影经历了许多冲击、危机、风浪，取得了



“电影：时代与人民”专题座谈会发言摘编

8月3日上午，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期间，由中宣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时代与人民”专题座谈会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此次电影专题座谈会是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重要活动，也是电影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这次会议回顾了中国电影十年来的发展历程，面对当前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在时代文化、人民同心、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的实践中，坚定了电影人团结一心、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的信心，既是理论阐释，也是实践宣言。下一步，中国影协将继续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深入贯彻“做人的工作”和“推动电影创作”，积极引导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创造中国电影又一个黄金时代作出更大贡献。

在全球都表现突出的复苏成绩，中国电影产能、电影市场恢复到疫情前的80%以上，电影创作在主流价值传达、温暖现实主义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类型和风格多元化等方面，都有新突破、新跨越。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面向，也是中国电影深化改革的良好基础。

第二，中国电影发展，居安思危，不可不察。全面深化改革，就意味着在发展中还面临一些新形势、新挑战，当然也面临一些新机遇。我们需要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首先，中国电影市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已经势在必行。过去20年，中国电影靠巨大的市场增量带动了发展动力。2017年之后，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已经从目前格局的体制性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金融形势、国际形势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至今中国电影企业依然大多数是单打独斗，规模小、媒介融合性弱、抗风险能力低。我们需要解决一些体制机制性难题，通过市场规律支持企业，包括加大对体量较大、技术基础较好的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形成整合化、规模化、平台化的大文化、大文化企业，使电影发展有更大的平台、更多的媒介、更科学的窗口，更“长尾”的效应。最近，剧本行业每年都会出现一些优秀作品，有艺术品质，也有市场的现象级优秀作品，如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繁花》《县委大院》《我的阿勒泰》《狂飙》等，恰恰是因为网络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三，中国电影的改革，需要继续完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目标应该是电影管理者和电影从业者达成共识，那就是如何破局，如何推进，则更为关键。需要做的事很多，首先是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这部法律是中国电影改革成就和智慧的法律结晶，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文化领域的行业法”，我们需要结合近年来电影管理、电影生产的深刻性电影改革文化氛围，营造一种既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高雅而不低俗的电影鉴赏氛围，这是一种健康的文明欣赏心态。这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要反对单纯以票房多少衡量一部电影的思想艺术价值，要建立注重人才培养的素养、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影观，应该是立足提升民族的电影欣赏素养、提升民众精神素养的精品力作，这种电影“一以当十”。在观赏《解密》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内心不禁涌起一个念头，若每年都能有数十部这样深刻描绘人类信仰、颂扬精神力量的佳作问世，且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年，中国电影改革的成果能否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一轮中得到延续和提升，文化强国、电影强国是否能够实现使命，还需要电影行业包括理论评论工作者、研究者同舟共济、共同探索。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势，做一些中国电影文化题材深度上的新尝试，这样的作品超越任何年轻人产生的共鸣。

说到“人民”，这几年我一直在调研。在我的每部电影创作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调研，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相比之下，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面对互联网的纷繁评论，常常让我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因为我始终坚信，网络上某些声音并不能全面且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这个词在网络上被过度使用，传统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最后一点，建设性的电影批评体系是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电影批评是连接电影作品与观众、电影创作人与电影创作者、电影学者与电影产业和管理者的桥梁，这些桥梁承担着承载力、科学性，对于电影与观众、电影与市场、电影与美学、电影与文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电影批评界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种批评往往在以“捧”为主，无论什么电影，开研讨会、写评论文章，都是一片赞美的声音，只有另一种批评，则往往以“棒”开路，对很多电影，无论是否已经上映，都是劈头盖脸一棍子，先是过度唱衰，然后上纲上线，由此可见，批评不独立，批评的价值就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在“流量批评”的舆论面前，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建设性的电影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取得不足，当然有学术界、批评界自身的原因，更有生态性的原因。建设性、专业性的电影批评体系失位的问题，使得“捧”和“棒”的批评有了更大空间，电影行业自身也难以获得客观的有深度的市场反馈、观众反馈和专家反馈。在“捧”和“棒”这两种形态之外，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建设性的独立的专业的批评机制，从评论队伍到传统媒介以及新媒介的平台，从影片渠道到经费来源，从评分标准到舆论引导，真正形成有标准、有方法、有判断、有建设性、有专业性、有深度的评论体系，引导观众选择适合的电影，反馈专业的意见给创作者生产者，将专业的数据和报告提供给管理者。

改革在路上，未来十年是关键性的十年，中国电影改革的成果能否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一轮中得到延续和提升，文化强国、电影强国是否能够实现使命，还需要电影行业包括理论评论工作者、研究者同舟共济、共同探索。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势，做一些中国电影文化题材深度上的新尝试，这样的作品超越任何年轻人产生的共鸣。

说到“人民”，这几年我一直在调研。在我的每部电影创作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调研，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相比之下，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面对互联网的纷繁评论，常常让我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因为我始终坚信，网络上某些声音并不能全面且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这个词在网络上被过度使用，传统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势，做一些中国电影文化题材深度上的新尝试，这样的作品超越任何年轻人产生的共鸣。

说到“人民”，这几年我一直在调研。在我的每部电影创作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调研，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相比之下，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面对互联网的纷繁评论，常常让我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因为我始终坚信，网络上某些声音并不能全面且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这个词在网络上被过度使用，传统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时代与人民：应变 张冀(中国影协副主席)

这次座谈会围绕“电影：时代与人民”这一主题展开，确实意义重大。聚焦我们所处的时代，主要特质就是一个“变”字。时代在变，对于我们这些深耕电影创作的同仁而言，不仅意味着挑战，更伴随着一种近乎痛彻的深刻感受。

首先体现在创作对象上的变化。以警察题材为例，近年来，创作焦点已从传统的技侦、刑侦转向经济侦查。这一转变更符合警察职业的特点。随着犯罪剧目的日益猖獗，传统刑侦案件的比重相对减少，警察们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调整。在我创作电影《三大队》时，深入调研发现更多金融、反诈这样的案件，警察队伍也在积极适应这种变化。他们研究互联网、反诈诈骗案以及大众心理学。这一过程，恰如电影艺术本身，在不断变化中寻求突破与新生。传统的刑警在转变的过程中会有痛苦，时代巨变下，不只是警察，包括医生、其他职业群体乃至创业者，都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调整自我，应对挑战。这也给予我们启示：电影创作要深入研究创作主体，要“应变”、要更细致、更深入地接触这些群体，敏锐地捕捉到他们的变化。

再举一例，关于奥运会女运动员化妆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讨论，至今仍有争议。这恰恰体现了时代在不停地变化，人也在变化。时代在变，很重要的含义是时代中的人在变，而人的转变又会反过来影响和塑造时代。对于女性运动员化妆这一现象，我认为它在于未来将成为主流趋势，尽管目前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与争议。回想2016年，当我初次注意到这一变化时，当时还未成为公众广泛热议的焦点，也许在未来才会真正广泛地变成主流。女性运动员化妆现象带来的启示是：某些社会现象变化的速度超过了艺术创作的步伐，我们必须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同时，我们所面对的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也在经历着剧烈变化。年轻观众虽不能代表全体，但他们文化消费的趋势与偏好却不容忽视。

年轻观众有一个关键词是“悦己”。我是70后，接受的传统教育需要“悦人”，很少谈“悦己”。另一个关键词，他们对于“包饺子”，也给我带来深刻的思考冲击。甚至某种程度上也在动摇我的美学信念。从传统角度来看，我非常欣赏的一种中国传统的美食题材为例，我去年看了十余本非常好的非虚构类生活、艺术、装备全面压制的境况之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规格电影技术已经领先国际，为中国在大屏显示技术上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技术窗口。

最后，以中影为例，谈的是循环转化为实现的一些思路。匹配供需、畅通循环，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命题。中影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自身的全产业链优势，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有力有效推进全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第一，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文化方向转化为创作与生产的全过程。一是抓好《志愿军》《志愿军：浴血奋战》等影片的创作和发行工作，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双创”精神。二是聚焦改革开放精神和伟大实践。开发一系列有关社会关注度、正面影响力的高质量影片。第二，从供给侧发力拓展市场空间。在进一步做强全国市场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主动寻求新发展，以新业态、新模式优化供给和提升服务。例如，近期推出的预约放映服务，就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势，做一些中国电影文化题材深度上的新尝试，这样的作品超越任何年轻人产生的共鸣。

说到“人民”，这几年我一直在调研。在我的每部电影创作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调研，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相比之下，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面对互联网的纷繁评论，常常让我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因为我始终坚信，网络上某些声音并不能全面且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这个词在网络上被过度使用，传统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凝聚精神力量，让电影 与时代一起破浪前行 傅若清(中国影协副主席)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势，做一些中国电影文化题材深度上的新尝试，这样的作品超越任何年轻人产生的共鸣。

说到“人民”，这几年我一直在调研。在我的每部电影创作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调研，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相比之下，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面对互联网的纷繁评论，常常让我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因为我始终坚信，网络上某些声音并不能全面且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这个词在网络上被过度使用，传统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势，做一些中国电影文化题材深度上的新尝试，这样的作品超越任何年轻人产生的共鸣。

说到“人民”，这几年我一直在调研。在我的每部电影创作历程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调研，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相比之下，影片宣传发行阶段，面对互联网的纷繁评论，常常让我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因为我始终坚信，网络上某些声音并不能全面且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这个词在网络上被过度使用，传统视听平台的“集中度”高，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影响市场，担当先锋。虽然增量平台化后也有可能出现“独大”的某些弊端，但是确实能够减少行业的无序竞争，增加创作生产的主动性，提升对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减少一些行业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要垄断，还包括行业竞争、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企业越大则越易自律，越会在法律法规内，甚至自觉超越自我，这些责任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形成行业规范，都取得了巨大提升。中国电影业需要提高集中度、聚合性，电影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包括电影院线、艺术院线的有效发行，只有彻底院线的过度竞争，形成规模发行，才能真正实现跨度、客厅电视模式受到新视听媒介的替代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这种100多年的消费形态的稳定性、封闭性，更不能避免受到挑战。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迭代升级更会对创作生产产生消费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国回应需要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创作积极回应和创新的预判，否则可能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总之，电影市场的增量空间广阔，电影创作生产的风声正烈，新媒介新技术的冲击，构成了中国电影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于电影人来说，当前的变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这些变化可能与传统的电影认知不一样。电影人要围绕年轻观众群体的核心变化，当前部分年轻观众可能表现出情绪化、激跃化的倾向，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在电影宣传阶段使其陷入被动局面，甚至负面声音就能迅速引发群体性的口碑危机，面对这种现象，创作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过多地受负面信息干扰，寻求新的、积极的、好的灵感与素材，不影响创作的主题。

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四川举办，四川这块土地孕育了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故事可以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方式讲，可以用人物传记片的方式讲，甚至可以用于王安石一放在古代背景下探讨个体命运的方式讲。关于苏东坡的题材已经生出十部乃至更多的电影佳作。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从内心抱有积极的认同与认可，这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与利用。《长安三万里》的成功，说明传统文化是一座亟待深入挖掘的富矿，它体现了时代在变，时代在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启示创作者要迅速地向这个回应，向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借